

# 丁先生和我

■ 潘承彪

我是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的。一年级时丁石孙先生就教我们《高等代数》。他讲课神采奕奕有独特风格，听他的课是一种难得的数学享受。讲课时他从不看书也没有讲稿，只有很少一看的小纸条一张。讲课的目的清楚，问题引入自然，思想、概念、方法、技巧、证明过程及举例解释、前后内容联系等一环扣一环，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整体的逻辑思维严格、清晰，强烈吸引学生聚精会神地听讲，具有引人入胜的数学美。如果把录音整理出来就是不用修改的书稿。他的课为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听他的课并不轻松，这种“享受”是我们通过不断努力适应，加强课前预习，课后思考才慢慢体会到的，数学真美啊！可是，从此后我和丁先生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听到的只是他挨批挨斗挨整受处分的坏消息，直到1977年。

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工作，1977年起同时在北大数学系工作，才开始见到了丁先生，那时他是数学系主任。他向我第一次布置任务是在1978年，当时根据中意文化交流协定，教育部

## 丁石孙与中国数学

要派一个数学代表团于1979年5月去意大利访问，这个任务就给了北大。由于对方要求介绍中国数论特别是陈景润的工作，丁先生就把这个任务给了我。天哪！这对我这个英语一不会听二不会说刚会读写最简单的英文数学论文的人来说是一个极不轻松的差使，该怎么办呀！任务再难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好在是和钱敏先生、萧树铁先生一起去，他们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尤其是钱敏先生热情地不厌其烦地帮我一遍又一遍修改，我自己借了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听，终于交了差，渡过了重回北大的第一个难关。这也是丁先生对我的一次很好的培养、锻炼和鼓励。

从此我和丁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他的研究方向是代数数论，我是学习解析数论的，当代数论的发展方向是要结合运用代数、分析和几何方法来研究数论问题。这样，北大的代数数论方向就为我们搞解析数论的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代数方法的机会，我和我的研究生从此获益匪浅，我的研究生选修了很多代数数论方向的课程，为他们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全面坚实的基础。丁先生很关心我的研究生并参加他们的毕业答辩，他也参加我邀请来访问的外国数论专家的学术活动。丁先生十分关心北大数论方向发展，在国际上近代模形式理论当时正受到数论界的极大重视，不断发展并取得好成果。他从美国进修回来后问我懂不懂模形式理论，要我重视这个方向，我当时只是知道一些情况及它的重要性，但真的不懂，在83年就请过裴定一教授为我的研究生讲授模形式理论基础。从此，我几次组织讨论班邀请国外专家来讲课，促进了模形式理论在国内的学习与研究。我为了让大学生学一些最基本的较直观的代数数论知识，讲了一门初等代数数论课，后来成为《初等代数数论》一书，这一过程得到了丁先生及其博士生赵春来教授的宝贵指导和许多具体帮助。

一个偶然的机，使我与丁先生有了一次直接相处。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兰州召开申请数学基金的评审会，承洞不能

去，商议后叫我替他去。丁先生当时已是民盟领导，也正好有工作要去兰州，开会的不少同志好久没见到他了，很想念他，所以想请他来会讲话见面。在兰州我们都住一起，他知道我也去且同一班机，就告诉我去机场时车来我们学校门口带我一起去，我们坐的都是经济舱。在兰州我们都住一起，很巧他和我住同一房间。我和承洞几乎天天通电话讨论数论问题。要回北京时，我去民航售票处确认我们的返程机票，售票员看了他的机票后就问我这位“VIP旅客”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听说“VIP”一词，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他是前北京大学校长。后来才想起去兰州时我们坐的是经济舱的第一排，这大概是对“VIP”的照顾吧！我比他提前一天早上回京，他叫我好好睡，他开了闹钟到时叫我。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有关这一往事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我陪同一位亲戚去看望住在美术馆后街的他的好友，北大西语系教授赵萝蕤女士。在交谈中说到了丁先生，她很郑重地说：在北大的所有校长中，她认为最值得人们记忆的是蔡元培和丁石孙。这使我心头一震！因为我们数学系的师生对丁先生作为老师、同事和系领导都很熟悉他，喜欢他，尊敬他，但我没听到过系里有人对他作为校长的评价，似乎谁也不在乎当北大校长的是谁。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校长时骑辆破自行车后座带一些萝卜白菜下班回家。后来又听说另一位文科的季羨林教授也有同样的看法，这在北大实在是罕见难得的。在我的印象中北大师生尤其是文科师生，对人的评价好像总是多元的，很苛求的，且争论纷纷。看来，这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

今年是丁先生九十华诞，好久没去探望他了，写下几件往事，以表心中对老师的深切思念，祝愿老师平安吉祥！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